



中西文化与 20世纪中国哲学

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编
学林出版社



时代与思潮

6

TIMES AND TREND OF THOUGHT

时代与思潮 6

中西文化与 20 世纪中国哲学

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编

学林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乐惟清

特约编辑：张晓斌

封面设计：周剑峰

中西文化与
20 世纪中国哲学

上海中西哲学与
文化比较研究会编

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(200233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.25 插面 1 字数 185,000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3000 册

ISBN 7-80616-559-2/B·48

定价 11.00 元

编 者 的 话

《时代与思潮》(第6辑)经过大家的努力,终于与读者见面了。该丛刊由“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”主持编辑出版。“研究会”的前身是“上海市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”,成立于1988年1月,后经上海市社联讨论和市民政局登记、批准,改为现名,是市一级学会组织。“研究会”(含“中心”)自成立以来,在推动和加强中西哲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、促进上海市与海内外学术联系和学术交流方面做了一些工作。出了五辑《时代与思潮》:即《五四反思》、《中西文化冲撞》、《中西文化交流》、《文化传统寻绎》、《文化传统辩证》。后来由于各种原因,刊物停下来了。现在与读者见面的第6辑,仍叫《时代与思潮》,以表明本丛刊的连续性。

《时代与思潮》作为“研究会”的会刊,宗旨仍是:立足时代,会通中西,反思传统,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。丛刊将遵循学术发展规律,提倡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,鼓励各家各派从事多领域、多层次的研究,尽量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潮和精华。

我会已故会长冯契先生多次提到,世纪之交的中国可能进

入“自我批判”和“反思”阶段。这是期望。系统地从多方面来进行“反思”，是下一代的事。但我们若能开个头，那就是尽到历史的责任了。冯先生这个看法是相当深刻的。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丛刊，认认真真地做一点工作，以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、伟大的民族。

我们要感谢江苏可一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毛文风先生，感谢本会副会长李志林先生。他们为本丛刊的编辑、出版、发行给予经济上的支持，而且在其他方面也给予了具体帮助。

学林出版社领导以其胆识和眼光，积极支持中西哲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，促成本丛刊顺利出版，特此表示敬意。

1997 年 12 月

“时代与思潮”编辑委员会

顾问：王元化 王亚夫 萧麓父

主编：丁祯彦

编委：丁祯彦 朱贻庭 夏乃儒 陈超南
 张庆熊 毛文凤 童世骏 李志林
 施炎平 施忠连 王恩重 崔伟闾
 郁振华 胡伟希 郭齐勇

目 录

编者的话	(1)
------------	-----

主 题 论 坛

哲学思考的自我回顾

——张岱年先生访谈录	张岱年 林在勇 (1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东西慧梦几时圆?

——世纪之交的文化寄语	萧蓬父 (10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探索、沟通、超越

——刘放桐教授谈现代西方哲学及其与

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

关系	刘放桐 孙向晨 林苏闽 (16)
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

世界性、多元性、互补性

——比较哲学研究的现状和前景	王森洋 (33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超越“国学”，融通中西	赵吉惠 (47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化倾向

探析 李维武 (55)

传统反思

儒家的理想人格和现代新人的培养

——兼谈冯契“平民化的自由人格” 丁祯彦 (71)

儒学的形上意义 杨国荣 (88)

“道家文化热”透视 陈耀庭 (99)

当代易学思潮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王振复 (110)

评儒家道德独断论 东方朔 (122)

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 李 申 (133)

天人合一说和冯友兰的新理学 尹大贻 (141)

哲学通信

冯契致友人书 (148)

西学探评

实用主义对理性和文化传统的看法

——从罗蒂谈到杜威和胡适 张庆熊 (156)

胡塞尔论“意向对象” 崔伟阔 (172)

海外论坛

差异比较与沟通理解

——当代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

倾向及障碍 [美]安乐哲 (189)

场有哲学再阐发

——罗嘉昌著《从物质实体到关系

实在》读后 [美]唐力权 (200)

瑞士学者耿宁谈王阳明的“良知”与

“见闻之知” 张庆熊 (215)

学术对话

突破“剪裁”、克服“模仿”

——关于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趋势

的对话 俞宣孟 方松华 (218)

动态辑览

近十年美国儒学研究之进展 施忠连 (227)

以色列学者施坦泽兹谈犹中文化 陈超南 (242)

附录一:

“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”领导机构

成员名单 (246)

附录二:

已刊《时代与思潮》全目 (248)

哲学思考的自我回顾 ——张岱年先生访谈录

○张岱年 ●林在勇

●为使人们对当代大师的学术贡献多一些了解,能否请先生对一生的学术活动大致作个概括和评价?

○我一生的研究可分三个方面:一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,二是关于哲学理论的研究,三是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。

在中国哲学史方面,我的工作主要是发掘、阐扬中国的唯物主义发展史。对这个问题,我历来是比较注意的。我认为,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唯物主义传统,历史上每一代都有至少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,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唯物主义思想继承、发展的历史。

同时,我也特别注意中国哲学的问题之体系。中国古代哲学有着与西方哲学不同的、自己的理论体系,其中许多概念、范畴也与西方不一样。对这些独特的概念、范畴,应该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理解。这方面我做了一些工作。

●这就是先生在青年时代完成的《中国哲学大纲》。这部著

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,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现出巨大的理论价值,是本世纪有数的几部足以不朽的哲学著作。请您再谈第二个方面。

○在哲学理论研究方面,我有一个愿望,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,以及 20 世纪早期西方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,三者综合起来。我从 30 年代起就比较推崇辩证唯物主义,但同时我感到,作为一个中国人,一定要对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加以发扬。此外,我也很欣赏本世纪初年西方分析哲学的贡献,其代表人物主要有三个,即罗素、摩尔、怀特海;后来又出现维也纳学派,对西方分析哲学另有发展,我对它也很有兴趣。但最终这一派不承认世界观的研究,认为哲学只研究科学命题,这一点我不同意。我认为,哲学终究还是要对世界观提出一定的见解来。

为了在哲学理论上综合上述三个方面,我在三四十岁期间做了一些工作,后来就没能继续做。

●建国时您刚届不惑之年。

○从 1957 年到 1977 年,二十年中我根本不可能研究西方哲学。限于条件,对分析哲学的新发展知之甚少,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缺憾。所以我对西方哲学的了解,主要还是本世纪初期这一段,现在我也很想研究西方哲学的新进展,但精力衰退了。我始终认为,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是最有价值的,但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要加以研究、分析、批判,后一项工作也非常重要。以上是关于哲学理论方面的,说得比较简单。

●那么请您继续谈第三个方面,您长期致力文化问题研究。

○1933 年我写了《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》这篇文章,讨论文化问题,主张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文化问题,既反对全盘西化

论,也反对中国文化优越论。在当时,主张全盘西化的是胡适之,主张中华文化优越论的是梁漱溟先生。我提出要综合中西文化的优长,然后努力做新的创造。当时我提的口号是“文化创造主义”,后来所用的名词是“综合论”。我多年以来一直就是这个观点,到80年代发表文章也还是这样讲。中体西用我反对,西体中用我也反对,我认为要运用唯物辩证法,把中西文化各自的贡献综合起来,创造新的中国文化。

●从您发表《关于老子年代的一个假定》、《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》等哲学论文算起,您的学术生涯已经一甲子又五年。您致力于哲学研究的原始动机,或者说您的根本“问题”是什么呢?

○我从二十几岁起就考虑哲学问题,最大的愿望是要提出一个比较正确的世界观。当时许多流派的著作我都读过,但我认为唯心论的观点不能成立;读了马克思、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,在比较中感到唯物辩证法还是最正确的,到90年代我还写了《为什么我信唯物主义》一文,发表在国家教委《高校理论探究》上。但在宇宙观、人生观、认识论等方面,还可以继续研究。

30年代我写了很多文章,我想把古今中外都研究一遍,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观点,但可惜没做到。尼采哲学、存在主义,我是不赞成的。一方面,一味地赞成不行,总要深入研究;另一方面,光不赞成也不行,对尼采所提出的问题还要加以解决,要知道他为什么在西方受欢迎。3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做过调查,尼采哲学都是最为流行的。尼采反对理性是一大错误。我认为既要肯定生命的价值,也不能排斥理性,应把生命力和理性综合起来。

●您人生中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?

○我这一生本想多做一点工作,可是从1957年到1977年,压力太大,尽搞运动了。尤其是“文革”那些年,根本不许看书,

林彪不是说过吗,百分之九十九看毛主席著作,百分之一读马列,别的书一概不准看。这对中国学术有很大的不良影响。

苏联在斯大林时代,对西方其他学说一概不许研究,认为都是反动的;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允许看西方的书,结果人们的兴趣就全都转向外国的东西了;不知现在的俄罗斯,情形又是怎样。

●先生说话非常平和,但寓意深刻,给人很大的联想空间。

○从 1978 年以来,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,改革开放,学术界也出现一片生机,可以随便研究各种问题。我也很想努力研究各种问题,无奈现在年老力衰,对许多问题研究得比较慢了。

●先生虽是八七高龄,但仍然著述勤奋,思维敏捷。只是您的哮喘比较厉害,让您讲话受累,很过意不去。

○这个病已经有好些年了。1958 年我被下放到京郊黄村劳动,有个学生发现说张先生有哮喘,我自己当时还浑然不觉。

●您是否愿意对 20 世纪的文化学术作一个估价?

○我认为,中国的 20 世纪,应当说是一个转变的世纪。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年的专制制度,虽不彻底,但是个大的转折;接着的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,对旧文化进行了批判,也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。

新文化运动,按毛主席的说法有两大功劳,一是反对旧文学,提倡新文学;二是反对旧道德,提倡新道德。这第一条可以说是完全成功了,过去文言居于主导地位,“五四”以后连学术著作也可以用语体文来写,这是个大解放,成就很大。而第二条道德问题就比较复杂,旧道德的威信算是被打倒了,当然也应该被打倒,可是“五四”时期胡适、陈独秀所提倡的“新道德”,实际是资产阶级道德,并不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,以致新道德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。新中国成立后的 50 年代前期,社会风气非常好,当时提倡的是共产主义道德。可是随后就慢慢地起了变化,及

至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把一切道德规范全都打倒了，结果使人民无所适从。

所以，现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建立新道德。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方向，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。建立新道德也应是这个方向，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、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道德。关于新道德，现在还在讨论，没有结论，但总之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对此我也有些见解，发表在《真与善的探索》（齐鲁书社 1988）、《中国伦理思想研究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）两本书中。

●先生怎样概括和评价自己这方面的思想？

○我认为我提出的比较有意义的问题是“民族精神”问题，在我以前还没有人提出。我认为一个民族，应该有一个民族精神。我此说是受到国外的启发，德国人强调日耳曼精神，后来法国总统戴高乐也特别强调法兰西精神。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伟大，具有五千年文化，我想也必定有一个民族精神，所以我从 30 年代就着力研究这一问题。一个民族的哲学不独立，那么这个民族是不可能独立的。

我认为，所谓民族精神，须符合两个条件：其一，作为一种思想观点必须具有普遍的影响，为多数人所接受；其二，须确实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。以此为标准，我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，就是两句话：“自强不息”和“厚德载物”。自强不息就是积极奋斗的进取精神，厚德载物就是宽容的精神。这两种精神在历史上影响很大，同时又确实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每当这两种精神都起作用的时代，那就是一个伟大的时代；反之，要是有一时期人们忘却了这两条，那个时代就是一个衰退的时代。所以我将这两点名之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，同时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。现在人们写文章对中国

文化精神提出很多条目,我为什么光提两条呢,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找出文化精神的核心。

●先生自述自己的哲学思想由三方面构成,而且在叙述时三者自有先后次第,但我觉得先生的思想倒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哲学的传统中的,这一特点比冯友兰先生突出。您刚才提到白话的积极意义,尽管现在您的文章使用语体文,但您过去的主要著作更倾向文言,这表明您并不认为中国独特的哲学思想,可以和中国特有的表达方式轻易分离。现在您讲中国文化的两条基本精神,用了两句话,您虽未明说,但却是真正从中国特有的传统中化出。乾卦的要义即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,坤卦的要义即“厚德载物”,以此来抓住文化核心是再精当不过了。先天后天,也就是首先强调刚,同时也强调柔……

○1933年我写了《中国思想源流》这篇文章,认为中国思想有两种对立统一的思想倾向,一是刚健思想,一是柔弱思想。孔子的儒家、墨子的墨家,是尚刚健的;老、庄的道家,是主张柔静的;后来佛教传入,也主柔静。现在我们与西方接触了,应着力吸收其刚健有为的观念,来创造一个新的传统。有同志强调道家的以柔胜刚思想很巧妙,柔当然也起作用,但我还是强调要以刚为主。

●先生抽象地讲尚刚,实际是要肯定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和一种建设性的态度吧,而且先生还认为这正是中国文化固有的倾向之一,并把它赋予了儒家和墨家。您当然是一位现代的哲学家,但由于坚持唯物辩证的立场,注重道德的意义和人的精神生活,这使得您在思想上同古代儒者更加亲近。那么就请您谈谈孔子。

○对于孔子的态度,1983年我就讲过,尊孔、反孔的时代都应过去了,现在是科学地研究孔子、正确地评价孔子的时候了。

孔子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文明,贡献巨大。孔子综合了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文化,提出了人伦道德的基本原则——“仁”。我认为“仁”最重要的一点,就是孔子所说的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。此话内容很丰富,思想很深刻。既承认主体性,承认自己有立、达的愿望,同时也承认他人的立、达愿望,帮助他人完成其“自我实现”。这种“人我兼顾”正是道德的主要原则,我认为至今仍然应予肯定。孔子能够提出这样的道德最高原则来,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无疑非常之大。

可是孔子有缺点。他虽然并不否定物质生活的重要性,他的治国之道就是既庶且富,然后教之,但他对于如何提高物质生活却少有研究。春秋时代有“三事”的说法,即正德、利用、厚生。正德就是端正道德,提倡精神生活;利用就是便利器用,让生产技术发展起来;厚生就是提高物质生活。而孔子偏重于阐发“正德”问题,以至于汉儒、宋儒对如何“利用”、“厚生”也很少加以关注、研究。这是儒家的缺点。从今天看来,三者都很重要,我们现在就是要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兼顾到。

●展望 21 世纪,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学术可能会有哪些新的发展,为此将做哪些工作?

○从 19 世纪以来,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救亡图存。经过一百多年一系列的斗争,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,才把帝国主义的势力完全赶出去,救亡图存的问题解决了,这在历史上将会日益显示出非常伟大的意义。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快五十年,尽管我们也努力工作了,但道路曲折,我们的经济文化还是比较落后。但是,国家独立终究有保障了,以此为基础,就能够真正赶上西方。

我认为,中国理应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,像历史上那样成为亚洲的一个伟大的力量。在汉唐宋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,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亚洲起了很伟大的作用,日本、朝鲜、越南都

使用汉字；像唐太宗，还是东亚地区的领袖“天可汗”。总之，到21世纪时，我们应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有所发展。我想，在科技方面，在中国本土进行科学工作的科学家，也会获得诺贝尔奖，对科学做出独立的贡献，达到世界领先水平。

在哲学理论方面，我认为还是应该鼓励进行各种研究。这有两点，一方面要确定主导思想。主导思想应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，因为新中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，故而新中国的发展也仍应循此基本路径。但是，这个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，不仅是指与社会情况、革命实践相结合，特别还要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。这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另一方面，要大力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，这与主导思想并不矛盾。就算是唯心论、宗教，也应承认其思想自由。有主导思想这个“一”，同时也可以有其他不同思想的“多”。因为世界是非常复杂的，某种学说很难说就达到了绝对真理。所以，为了文化的发展，应该肯定思想自由，应该承认不同派别的正当权利，而“百家争鸣”是学术进步的一个重要保障。我认为，既肯定“多”，也不否定“一”，这就是辩证法的观点。

●本世纪因为西方哲学的引进，促使我们对中国哲学史作系统的发掘整理，像先生等几位大家都建立了体系。但随着时代的变化，单纯“回应式”的钩沉国故也许将越来越多地让位于“自主性”的哲学创造。那么，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将会呈现怎样的趋势？

○我感到，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很多很多，大可以再钻研，再有所发展。譬如中国古代的唯物论、唯心论、道德哲学、价值学说，这些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。再譬如西方现在提出解释学，写了很多著作，其实中国古代也有解释学，而且